

日本近百年史綱

臧廣恩 著



華聯出版社印行

112
N 6
564

日本近百年史綱

臧廣恩著



HS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

日本近百年來史綱

編著者：臧 廣 恩

出版者：華 聯 出 版 社

九龍花園街八八三號

承印者：同興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廈門街九十五號

序

這本書是我於一九六八年，在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所講授的「日本西化史」的講義，以後經過刪改修正而成的。輔大與京都產業大學於一九六七年結為姊妹校，我是以產大的交換教授身份而返國講學的。

如衆所周知，明治維新開始於一八六八年，而到了一九六八年，恰為一百周年。無可否認的，日本的近代化，是始自明治維新，而且我們根據事實，可以知道日本確實由於明治維新，才由一個比我們當時還落後的閉關自守的島國，一躍而成為世界列強之一。並且發動侵華戰爭，其利害得失姑置之不論，這種侵略的原動力，即由其西化——近代化的成功。

明治近百年史，無疑為我們中國的百年國難史，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雖不僅只日本一國，但使我們受害最深最廣的，則為日本。吾人身受其害，豈能輕易忘記！但凡事必須「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過去國人每於受到日本侵略之後，全國上下，惟有痛恨咒罵，很少肯虛心檢討其原因，並由此獲得教訓。國人甚至悞於崇拜西洋惡習，認為日本之強，僅僅不到百年，其原因乃在模倣歐美，而其成就實微不足道。彼既學自歐美，吾人又何不直接取自歐美，自然可以達到國富民強的境地，

這種似是而非的心理，一直根深蒂固地植在我們腦中。

然而事實擺在我們面前，遠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日本即為世界三強之一，當時即能與英美爭奪海上霸權。雖然由其得意忘形，不度德量力，而發動侵華以及太平洋戰爭，終致遭到自取滅亡的慘敗，但會幾何時，不到二十年，又一躍而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且將成為「政治大國」，其原因何在？實足發人深省。

于樞機主教，有鑑於此，特商請日本京都產大派本人返國講學，專講日本西化歷史，其用心與見識，實在令人欽佩。

日本明治維新，與我們的清末變法自強，前後相距不遠。但日本大告成功，而我們則歸於失敗，此中原因安在？在今日高喊近代化的現階段，我們委實有虛心加以研討的必要。關於這一問題，非但過去日本歷史學者之間，有所研討，本書中且不憚厭煩的加以介紹，而英國近代歷史學大家陶因比，一向對於日本德川幕府史，與明治維新史具有濃厚的學術興趣，他在一九六七年訪問日本時，與日本學者，也曾討論到中日兩國西化的成敗問題，足資吾人借鏡。陶因比於一九六七年冬季到日本時，曾以「近代日本」為題，在東京國際文化會館，舉行過一次講演會與座談會，談到日本吸收西洋科學技術之成功，有其精闢的見解，頗值吾人注意。

京都產大荒木校長曾謂：西洋科學技術之傳入中國，乃在明末，而日本之有西洋科學，却在德川

將軍青宗放鬆番書入境之後。然日本科學却非常發達，但中國直到現在，還未真正生根，其故安在？對於此一問題，陶因比曾如下的做了一個非常透闢的解釋。

陶因比說，其唯一原因，即爲日本在明末以前，早已接受了外國（中國）的文化與宗教，而中國則否。因爲日本，有了此種接受外國文化的經驗，以後對外國文化的吸收，就沒有遭受到阻力與障礙。他說，德川幕府曾以最大努力，獎勵儒學，但須知此種儒學，又何嘗不是外國文化？由中國人看來，中國即爲世界的中心，新的思想頗難爲中國人所欣然接受，這種牢不可破的思想，即爲中日兩國對西洋科學態度上的不同之處。但陶氏也補充說：

「吸收近代技術，中國人並非先天即缺乏適應性。例如目前的馬來亞、印尼、美國的華僑，都成功的吸收了近代技術。我以爲中國對外國的阻力，恰如俄國對回教徒一樣，他們對西洋文明，具有一種優越感。當然，日本也以爲自己的文化比人強，不過日本所認爲日本的文明，如究其本原，亦非日本所固有，所以拋掉中國文化而吸收西洋文化，那是比中國要來得簡短徑捷的。」

陶氏的這段話，在我們今日高喊復興文化的現階段，委實值得慎重反省與參考的。筆者留學日本與旅居日本，前後幾達二十五年，雖然眼看日本一天一天的進步，且一如國人的看法一樣，總以爲日本不如英美，無甚可取之處，此次藉著講學的機會，能客觀而冷靜的對日本的西化史，做了一些研究，才恍然大悟，日本西化的成功，自有其原因。

一九七〇以後的太平洋新時代，實爲中、日、韓唇齒相依的三國密切合作時代，日本今日已非我們的敵人，而爲我們亞洲地區共同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友邦，我們對於他們百年來成功的經過，實應予以鄭重的研究與效法。

筆者向來拙於著述，尤以近十幾年來，深感人生如幻、世事無常，與其埋首於咬文嚼字、引經據典之間，不如退而深思，行不言之教，參無用之用，如能在心靈上有所契悟，或者更加妙用無窮。所以這本書也許就是筆者對現實社會的一個最後的禮物，今後如果天假以年，就打算及早在生死大事上，作一番天人合一的研究工夫了。

臧廣恩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二月序於臺北師大宿舍

目錄

第一章	明治維新的歷史背景	一
第二章	明治維新	二八
第三章	文明開化與自由民權運動	五五
第四章	修改不平等條約與中日、日俄之戰	七九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產業革命	九五
第六章	西洋文化的吸收與發展	一二六
第七章	九一八事變的前因後果	一四二
第八章	由侵華到無條件投降	一六九
第九章	日本的投降與新生	一八七
第十章	盟國佔領政策的轉變	二一〇
第十一章	日美新安保條約體制下的日本	二二二
第十二章	一九七〇年代與日本	二五四

第一章 明治維新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敘言

日本開國年代，舊史家雖有公元前六六〇年神武天皇開國之說，但日本新史學家認為無歷史根據，加以否定。不過日本開國在公元前二、三世紀，似有可信。日本雖無紀錄可考，然我國史乘記載明確。參見「漢書地理誌」、「後漢書東夷傳」、「魏志倭人傳」、「宋書倭國傳」、「隋書倭國傳」等書，均有研究日本古代歷史的基本資料。

吾人從日本文化史的觀點論之，日本大化革新（公元六四五年——七〇七年），與明治維新（公元一八六八年——一九一二年），為日本歷史演進的兩大關鍵。前者使日本民族脫離部落時期，進入文明統一階段。對於古代日本文化之開拓、典章制度之樹立，道德風俗之形成，影響至深，實無待多贅。

後者使日本中央集權，實施憲政，模倣西泮，富國強兵，國家得以近代化。故能一戰勝清，再戰勝俄，一躍而為世界強國之一。所以日本史家，論及日本歷史文化演進過程，必須將大化革新與明治

維新，相提並論，因二者同等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價值與地位。可以說：若無大化革新，則無古代日本文化；若無明治維新，則無近代日本文化；且二者的歷史因果關係，亦甚密切，此乃不可不加說明之處。

原來大化革新，雖然奠定了大和民族統一的國基，惟在政治方面未能十分走上軌道。因爲自七八一年至一一八五年，實行所謂攝關政治，於是莊園與武士制度開始形成，遂啓後來武家政治之漸，影響所至，近代日本亦不例外。因爲一一九二年，武士源賴朝首開幕府於鎌倉，掌握政治實權，天皇與公卿，形同虛設。迄至一三三八年足利尊氏，繼於京都室町地方，設立室町幕府。至一五六八年，織田信長崛起，室町幕府遂告覆滅。但室町末期，各地諸侯割據稱雄，兵連禍接百年之間，形成日本歷史上最黑暗的戰國時代。至一五八二年，織田因倒下過嚴，爲部下暗殺，統一大業功虧一簣。織田死後，豐臣秀吉崛起，繼其遺志完成全國一統之業。一五八八年，豐臣病死，一六〇〇年德川家康於關原一役，擊敗豐臣勢力；遂於一六〇三年，恢復幕府政治的組織和體制，繼承源氏和足利氏的獨裁傳統，建立江戶幕府，號令全國；直至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史稱江戶時代。其間二百六十五年，是日本歷史承先啓後的樞紐，是近代日本形成的關鍵，也是日本歷史上最昌隆的治平盛世，而且是世界歷史很重要的一頁。尤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施政，對於明治維新，都有直接間接的因果關係。故吾人研究明治維新史，而不重視此一歷史背景，實有斷章取義之嫌。因爲日本文化，前已言之

，明治已前，完全受中國、朝鮮、印度文化之影響；明治以後，積極模倣西洋，雖然受西洋文化之影響爲深，但是國民習性，以及武人專制封建之潛伏力量，影響明治維新的成果，至爲深遠，實亦不可否認之事實。所以明治維新，雖然國力膨脹，發展迅速，但是至大正、昭和時代，却恢復武人專制之局勢，發動侵略，貪得無厭，招致二次世界大戰之慘敗，幾乎亡國，此乃自食其果，無可怨尤。日人撫今思昔，宛如大夢一場，良深感嘆。然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憬然覺悟，猶有作爲。茲簡述江戶幕府之興亡，以及當時國際局勢之概略，由此可知明治維新歷史背景之真面目，以作吾人明治維新之新評價的參考。

第二節 江戶幕府之衰亡

一六〇三年，德川家康開創江戶幕府，積極發展獨裁專制的統治，一反以前懷柔政策，而改以高壓手段，強迫統制。其最具體的方法，則爲公武法度之制訂及幕府制度之建立。所謂公家法度，即實行種種控制朝廷的辦法，連朝廷授與官位之唯一權威，亦予剝奪；所謂武家法度，即規定全國諸侯共守之憲章，尤其對於諸侯參親交替的規定，最爲嚴格。

家康的種種設施和政策，在其生前，已有偉大成就；繼而二代將軍秀忠、三代將軍家光，繼續經營締造，德川的集權制度，遂臻健全而完善。德川初期的政治發展，乃是德川時代的重要過程，史稱

此時代爲「三代之治」。這時代也是德川二〇〇年治平盛世的基礎。從日本整個歷史看來，也是亘古未有的盛世，成爲明治維新的社會基礎，其故在此。

德川氏第一時期的武霸主義，至三代家光死時，告一段落。四代將軍家綱，一反先人傳統，改持文治主義，史稱寬文之治。此亦近代日本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轉變，因爲它不特使江戶幕府的歷史，放出光芒異彩，而且當集權武斷主義的效用，達到極點之際，它又爲德川長治注入了新血輪。這個轉變，後經五代綱吉、六代家宣（史稱正德之治）、七代家繼，繼承不變，前後凡六十餘年，至八代將軍吉宗，始恢復韜道政治。文治主義沒落之後，經吉宗享保改革，史稱享保之治。其新設施甚有可觀，尤其崇尚儉德的精神，稱譽後世。至於調查全國人口，以及封建司法制度的改善，亦爲其重要之政績。

近世封建日本的刑法，自經吉宗改革後，規模已備。又在文化、經濟方面，亦有不少的建樹。他於一七二〇年，廢除禁止外國書籍進口的法令，西方學術思潮因此有機會流入日本。又曾由青木昆陽和野呂文，學習荷蘭語，開以後所謂「蘭學」興盛的先河。這種措施，導致日本和世界接觸，亦可說那是日本對鎖國主義的初步反動。關於後者，他於一七一九年以後，積極獎勵所謂新田開發，使許多平民變成大地主，但是結果令米價下降，一般武家的收入，因此減少，其最後副作用，就是動搖武士階級。這些歷史事實，都與明治維新有直接間接的因果關係。

吉宗於一七五〇年逝世，九代家重，十代家治，前後二十年。自十一代將軍家齊時代起，近代的日本內政，在在與外國勢力有關。過去約二百年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難再延續，且成爲幕府衰亡主要原因之一。加以家齊末年，政治腐敗，賄賂公行，財政紊亂，民變時生，幕府衰弱情況，漸漸表露。此後十二代家慶，雖有天保改革之舉，然僅曇花一現，欲振無力，於是幕權沒落，雄藩崛起，輾轉至十三代家宣，十四代家茂，十五代慶喜，遂有勤王倒幕的成功。德川二百六十五年之興衰過程，概如上述。茲綜合分析其衰亡原因，約有五點：

(一) 思想指導，外法內儒。(二) 財政困難，武士沒落。

(三) 幕政腐敗，內部分裂。(四) 外力壓迫，應付失策。

(五) 強藩崛起，政權轉移。吾人由此五點觀察，當知明治維新之真正原動力所在矣。

第三節 思想指導 外法內儒

德川家康，一代英傑，性格富於勇敢和機智，尤其忍耐與犧牲，更是他成功的要訣。論其才華心術，頗似明太祖朱元璋，故他能在極其複雜的環境中，披荆斬棘，創立大業，且爲以後二百餘年幕政，奠立基礎。至於秀忠，秉性堅毅，篤實謙恭，其剛毅英明，有似乃父。三代的家光，才華卓越，堪擔重任。祖孫三人，雖然施政大計，類似法家，但受儒家思想之影響亦深，觀其所訂武家法度，可知

大概。至於三代輔弼大臣，多爲修養深厚之侯家，均能殫精竭慮，善盡輔弼之責。因此上下同心，忠勤相勵，實際收到儒法相濟之功效。這對以後各代主要人物的思想指導，亦極深遠。茲略述其原委，以明究竟。

吾人必須了解江戶時代之所以能肩負承先啓後的時代使命，主要原因，是以宋明理學作爲領導思想。因此神權及王權思想普及，漢學發達，遂構成明治維新的思想指導。但是此一重要關鍵，許多有識之士，並未能深加體認，予以重視，作者特爲強調，並敘述其經過於後。

江戶前期及中葉，受朱學影響最深，末期則受王學之影響較鉅。原來自七八一年至一八六八年，前已言之，日本政治實權，完全掌握在武家諸侯之手。但一二九八年（按南宋亡於一二七九年），臺州人僧一甯，由元至日，以朱子四書集注傳贈僧師鍊、玄惠（參見一山語錄）。此爲理學傳入日本之始。這一三八一年，僧義堂，向將軍足利義滿，力言新儒學朱注四書之優越性（參見空華日二集）。此後日本武士之中，亦漸有名分論之興起。蓋因多年戰禍，民不聊生，國人統一之願望，油然而生。且室町時代，中央文化向地方發展，武家文化流入平民階級，遂啓平民文化之漸，此爲重大之演進。加以朱學之隆盛，禪宗的崇尚，以致在文學、工藝、生活各方面，儒學禪宗色彩，皆極濃厚，亦爲此時的特徵。凡此特徵，對於此後織田、豐臣的統一事業，影響至深，可爲明證。

一六四五年，清兵陷金陵，浙江餘姚人朱之瑜，號舜水，由舟山至九州，乞師日本。當時水戶藩

主德川光圀（參見辭源）。以國師賓禮之，然乞師終不就，但此後幕府上下及民間學者，多從舜水問學，遂開水戶學派。

實際德川尊儒運動，在家康時代，即已開始。他確立朱學爲儒學的正統。當時他曾任用大儒林羅山司幕府學政，對朱子之學，努力弘揚。故舜水至日後，朱學更爲盛行。幕府始終指定朱子學爲國學校，廢淫祀，設社會，宏揚儒家教化思想，普及孔子倫理教義。而每代宰輔重道，自保科正之、酒井忠勝、柳澤吉保、新井白石，均有施政才能，亦均儒學名家。新井太老老師藤原惺窩，爲一代大儒，朱學泰斗。前云之林羅山，卽其弟子。羅山弟子尙有木下順庵、室鳩巢等，均純粹朱子學者。又酒井之師山崎闇齋，號稱南學，爲學主張正義理，嚴師道，重實踐，尙節義，不屑記誦詞章。另有貝原益軒一派，則主張不立門戶，潛心修養，亦均朱子學派。

當朱學鼎盛之際，與之對抗之陽明學派，後亦繼起。王學創始者爲中江藤樹。最著名之繼承人爲熊澤蕃山，爲學努力自反慎獨，追求知行合一，公卿學者甚多。幕府以朱學爲正統，且熊澤是浪人出身，幕府遂忌嫉而痛惡之，曾將熊澤幽禁，然而王學依然鼎盛，人才輩出，形成在野派的理學中堅，而與幕府對抗。尤可注意者，當時該派產生許多自由思想家，其進步的傾向，甚爲激烈。職是之故，以後明治維新的志士，如有名的吉田松陰等，均由該派產生。

因爲德川末期，紀綱廢弛，財政窮困，武士沒落，人心思亂，加以維新志士，受英俄侵略之刺激，先者有安內攘外之論，故鎖國閉國之爭，至爲激烈。迨一八五四年，日美神奈川條約簽訂之後，彼輩更積極主張「尊王攘夷」，倡導打倒幕府，王政復古。而各地雄藩，尤其長州、薩摩兩大勢力，更利用此一思潮，作爲打倒幕府、爭門政權之手段。由上言之，可知明治維新的思想領導，實以王學志士爲主。同時幕府內部，尤其將軍慶喜，深受水戶學派思想的薰陶，大義名份，嚴格分明，其本身亦富有王政復古之意識，未曾全力領導對抗反擊；故幕府失去中心領導人物，當朝廷下詔討幕之日，幕府亦正奏請「大政奉還」之時。未經長期大戰，避免流血慘劇，亦未使國家淪爲國際鬥爭的犧牲品（按當時法人支持幕府，英人支持朝廷），遂能拯救日本內戰於千鈞一髮之際，而爲現代日本留下較爲穩定的社會基礎，提早完成政治統一之新局勢，迅速接受西方文化的成果。

總而言之，可知日本若無德川時代之建樹，何能對抗西洋之侵略？而德川若無理學之滋潤，明治豈能及時維新？所以朱學奠定德川時代的學術基礎，王學啓發明治維新的自信。故「尊王攘夷」之「春秋大義」，一經提倡，上下同心，共赴國難，完成維新偉業，所謂順理成章、水到渠成者是也。故作者認爲，德川衰亡，此一外法內儒之思想指導，實其主要原因。

第四節 財政困難 武士沒落

幕政初期百年之間，政治安定，財政寬裕，但文治時代之後，財政危機日趨嚴重。八代將軍吉宗（一七一五年——一七五〇年）崇尚節儉，發債爲雄。一反文治時代的弊風，造成江戸時代有名的享保之治，雖然幕府統制得以維持，但經濟危機並未解除。當時幕府被迫對商人停止付帳，幕府直屬武士被迫以俸米折賣錢幣或透支過日，一七一九年，幕府爲應付難關，頒發所謂「奉捐令」，停止受理關於金錢的訴訟案件，以幫助大部份處於債務人地位的直屬武士實行賴債，藉救武士一時之急。

此一措施，使商人亦互相賴債不還，於是商業危機普遍爆發。同時武士的經濟通融餘地，亦從此斷絕，更使他們生活窮困。

幕府當時除採取節約和消極的停止債務關係的步驟之外，在積極方面，另行實施許多增加收入的辦法，以圖克服財政危機。如令各地諸侯向幕府獻米，又令農民增加納稅額，並獎勵農業增產。至此幕府財政危機，雖一時得以勉強應付，然諸侯、農民、商人方面的經濟窮困，則疾苦日甚。

到了九代將軍家重（一七四五年——一七六〇年）及十代將軍家治時代（一七六〇年——一七八六年）事實上完全是由田沼意次父子當政，日本史家稱爲田沼時代。他們實行功利主義，更壓榨農民商人，貪污舞弊，以致政治墮落、社會黑暗，於是人心怨望、聲譽日非。當時民謠有云：「近年來最